

CAMBRIDGE

剑桥日本史
(第5卷)
19世纪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
Volume 5:
the Nineteenth Century

【美】马里乌斯·B. 詹森 主编
王翔 译

CAMBRIDGE

剑桥日本史 (第5卷) 19世纪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
Volume 5:
the Nineteenth Century

[美]马里乌斯·B.詹森 主编
王翔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剑桥日本史 (第 5 卷): 19 世纪 / (美) 詹森主编 ; 王翔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3

书名原文: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

ISBN 978-7-308-12974-9

I. ①剑… II. ①詹… ②王… III. ①日本—历史—
19 世纪 IV. ① K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43657 号

剑桥日本史 (第 5 卷): 19 世纪

[美] 詹森 主编 王翔 译

责任编辑 叶 敏

营销编辑 李嘉慧

装帧设计 蔡立国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制 作 北京百川东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48.25

字 数 759 千

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2974-9

定 价 1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www.zjupress.com>

目 录

总编序	1
第 5 卷前言	5
导论	7
普林斯顿大学 马里乌斯·B. 詹森	
一个终结，一个开始和一个转型	12
转型的舞台	16
历史学家与 19 世纪的日本	38
第一章 19 世纪初的日本	51
马里乌斯·B. 詹森	
将军与摄政者	52
宽政改革	53
城镇，旅行和城市文化	62
农村：增长，盈余，以及管理的难题	71
西方世界的形象	86
综合考察	108
第二章 天保危机	113
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和文明系 哈罗德·包利瑟	
天保饥馑	114
民众骚乱	117

外部威胁	121
批评家及其批评	122
藩政改革	129
幕府改革	135
水野忠邦	149
余 波	153
启 示	158

第三章 德川晚期的文化与思想 163

芝加哥大学 H.D. 哈洛特宁

游戏的文化	163
文化的游戏	172
嘉言懿行及其支配能力	176
崇拜的复兴与作品	190
济世救民的宗教	205
沿海防御和国家富强	221
多元文化实践与政治集权的胜利	240

第四章 外国的威胁与口岸的开放 247

伦敦大学 W.G. 比斯利

锁国政策面临的挑战	249
1857—1858 年的商业条约	258
执行中的问题	270
最终解决	280
通商口岸体制下的贸易关系	285

第五章 明治维新 289

马里乌斯·B. 詹森

内忧外患	289
哈里斯条约及其后果	295
“尊攘”派	300
朝廷与幕府、大名的类型	304
条约口岸与外国影响	314
幕府的垂死挣扎	321
各地的改革	324
“王政复古”	330
历史上和历史编纂学中的明治维新	336

第六章 明治初期的反对派运动，1868—1885 343

爱荷华大学 史蒂芬·佛拉斯特

早期的农村抗议活动	344
明治地税与村民抗议	348
“士族”叛乱	357
民权运动	375
结语	396

第七章 日本转向西方 403

东京大学 平川佑弘著 若林正译

书的媒介：现代西方文明的初次认识	406
从理论到实践：德川晚期和明治早期的出国旅行者	418
文科和理科的教师：明治时期雇用的外国人	435
西方思想和制度的日本化	440

资本主义精神：第一批西洋文学的译书 445

回归日本：明治年轻人中的自我意识 454

第八章 社会变迁 465

普林斯顿大学 吉尔伯特·罗兹曼

各种假想的再思考 467

社会分层 470

城市转型 496

家庭决策 509

结论和比较 521

第九章 19世纪的经济变化 527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西德尼·E. 克劳科尔

19世纪初的经济 529

天保改革 542

对外贸易的开放 553

明治维新：连续性与变化 557

经济发展，1868—1885年 561

转型及其本质 565

第十章 明治政治制度 569

W.G. 比斯利

初步决策 571

“废藩” 578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 589

明治宪法	597
1890 年以后的政治社会	610
第十一章 明治时期的保守主义	619
华盛顿大学 肯尼思·B. 派尔	
对日本启蒙运动的挑战	621
早期明治保守主义：道德需要	624
保守派与外国关系的问题	631
官僚保守主义的出现	639
通往工业社会的保守派	645
保守派的社会规划	651
明治保守主义的遗产	656
第十二章 驱向强国地位的日本	661
芝加哥大学 入江昭	
现代国家的外交政策	661
明治时期的政体与社会	667
国内事务与外交事务的交织（1868—1880）	672
国内政治与海外扩张（1880—1895）	683
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1895—1912）	699
征引书目	715
词汇索引	745
译后记	759

总 编 序

自 20 世纪以来，由于这种在各卷编者指导下由多位专家所撰写的多卷本系列著作的方式，剑桥的历史叙述已经在英文阅读的世界中建立起一种模式。撰写《剑桥日本史》的计划开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并于 1978 年宣告完成。这一任务可并不轻松。对于西方的历史学家来说，日本历史的详细情况并不是尽人皆知的事情。日本的文化模式与西方的文化模式有很大不同，尤其是在专业术语和语言文字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令人望而却步的问题。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在以现代概念性和方法论的术语重新阐释日本历史方面，国外的学者一直得到 20 个世纪的日本学者们所取得的卓越成果的帮助。

在日本的文化和思想构成中，历史一直扮演着一个主要的角色，而日本的历史记录也是悠久和完整的。自古以来，日本的统治者就已经在神话和历史的传说中寻找其合法性，而日本的思想家们也是从他们国家的过去探索出民族道德和价值观念的体系。历史的这种重要性还因早期阶段即已进入日本的大陆文化的影响而越发加强。随着日本人的思想意识转为关心王朝的起源问题，随着日本人在时间和现实方面逐渐表现出佛教的观点，随着日本人为了武士阶级的统治寻找理由，日本的历史表述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到了 18 世纪，当时的历史言说又需要解释政体的神性，需要证明统治者的地位来自于他们的美德和仁慈，还需要说明政治变迁已经导致形成了一种神道教、佛教和儒教规范的高度自觉的融合。

在 19 世纪，日本人开始熟悉西方的历史表述方式，并且感觉到有必要使自己国家的历史适合一种更为普遍的世界历史的叙事范式。由于现代日本国家接受了它在其他国家中的位置，日本的历史述说也就面临着把狭隘的过去与更为普遍的现在调合起来的任务。历史学家们了解了欧洲文明进程的种种往事，并把 19 世纪的日本描述为脱离武士统治、重归君主政体之下文官制度的过程，而这正是

更为普遍的、世界性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巴克尔（Buckle）、基佐（Guizot）、斯宾塞（Spencer），以及之后的马克思（Marx），都相继提供了历史叙事的框架结构。

不过，20世纪的天皇制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起到了抑制普世主义在历史叙事中充分表演的作用。帝国领域的扩张及其意识形态的膨胀迫使历史学家们循规蹈矩，尤其是在有关日本国家起源的问题上不得越雷池一步。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带来了这些压制因素的解放，取而代之的是在一段时间内对帝国的自负进行强制性的谴责。很快，高等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日本学术界在研究尺度和多样性上的种种变化。历史研究的自由如今得到了大范围的扩展。朝向西方世界的新开放，带来了对于西方诸般历史表述方式的浓厚兴趣，以往那些小心谨慎并耽于考证的历史学者们也开始以更为广阔的视野来重新思考历史的资料。

也正是在这一时刻，对于日本历史的认真研究开始在西方世界兴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英语世界中唯一著名的关于日本历史的综合评述是 G. B. 桑塞姆（Sansom）的《日本：简明文化史》，该书首版于 1931 年，此后一直在销售。英国和美国学习日本学的大学生，许多曾在战时语言培训项目中接受过训练，很快就能前往日本学习游历，并与日本学者一起参与合作研究计划。国际性的讨论会和专题研讨会所产生的多种论文集，成为了衡量日本史研究的理论焦点和叙事技巧进步的标杆。就日本国内而言，历史学术的繁荣，图书出版的普及，以及历史浪漫情怀的流露，都提高了一个国家的历史意识，见证了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种种引人瞩目的变化。

1978 年，作为检验日本史研究水准的一项工程，编纂这部日本史系列著作的计划被提上了日程。当代西方历史学家能够利用现代日本历史研究成果的坚实基础。把这部系列著作的卷数限制在六卷之内的决定，意味着诸如艺术史、文学史、经济史的一些方面、科学和技术史，以及地方史等一些丰富的内容将不得不忍痛割爱。本系列著作既得益于日本，也得益于西方世界那些严肃认真的研究及其出版物。

虽然多卷本系列著作自 20 世纪初以来就在日本多次出现，但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西方世界接受过专业训练的日本史学者的数目仍然太少了，不足以支撑起这样一项事业。虽然这样的历史学家的数目有所增长，本丛书主编仍然认为最好

的办法是利用日本的专家来撰写他们有明显优势的那些部分。在这样的情况下，翻译行为本身也就包含了一种编撰合作的形式，这种合作需要历史学家们训练有素的技能，这些历史学家的姓名理应得到承认和鸣谢。

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多卷本日本史的主要目标是优先考虑英语读者的需要，而提供一部尽可能完备的关于日本历史的记录。但是，日本的历史之所以引起我们的注意，还由于其他一些原因。从某些方面来说，似乎我们对日本了解得越多，我们就越会被其与西方历史表面上的相似性所吸引。关于日本历史发展过程的悠久而连续不断的记载，使得历史学家们禁不住想要寻找日本与西方世界在政治模式和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似之处。现代日本民族国家的迅速崛起，曾经占据了日本和西方相当多历史学家的注意力。另一方面，专家们也都有意愿指出通过似是而非的相似性而误入歧途的危险。

我们在认识日本历史方面所取得的显著进步将会不断持续并加速。关注这一重大而复杂的研究目标的西方历史学家将会继续努力推进自己的研究事业，他们也必须这样做，因为日本所扮演的世界角色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们这个世界需要更加广泛和更加深入地认识日本，这将继续是一件显而易见的事情。日本的历史属于世界，这不仅是因为人们具有认知的权利和必要性，同时也是因为这是一个充满兴味的研究领域。

约翰·W. 豪尔

马里乌斯·B. 詹森

金井 圆

丹尼斯·特威切特

第5卷前言

书中日文名称根据日语罗马字拼法的赫伯恩系统而罗马字化，中文名称则依照韦德－贾尔斯系统罗马字化。除了引用以英文写作的日本人名之外，日本和中国的人名都遵循其本国的构成形式，姓氏置于名字之前。在存在个人姓名非止一种文本的情况下，作为专门名词，它们将在词汇索引表中以英文和日文两种形式加以表现。脚注中引用的参考文献，依据本卷末尾引用的著作目录的作者姓名，按字母表顺序排列。至于日期，在1872年日本采用西方历法之前，日本和西方的纪年并不完全吻合。在1872年之前的纪年，一般给出的是日本阴历的月份和日期，同时加上与之最为吻合的西方年份和月份（例如，1848年4月）。在月份和日期已经转换为西方日期的情况下，它们则将以西方的形式加以表达（例如，1868年4月6日）。

我们衷心感谢日本基金会承担了本卷书稿撰述及日本专家所写章节翻译的全部费用，还有书稿编辑与会议讨论所需的花费。在本卷撰写过程中的那些年里，许多年轻的学者曾经通过在文字处理机上打印文稿、使术语用法规范化，以及汇编参考书目和词汇索引等，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帮助。若林正（Bob Tadashi Wakabayashi）对于本卷编辑的帮助尤其显得重要。卢克·罗伯茨（Luke Roberts）和李·巴特勒（Lee Butler）汇集了引用书目的清单。大卫·哈维尔（David Howell）和托马斯·斯凯洛（Thomas Schalow）编译了词汇索引表。在此，我们谨对他们，并对斯科特·米勒（Scott Miller）和康斯坦丁·瓦帕里斯（Constantine Vaporis），特别是对本卷的各位撰写者致以谢意，感谢他们的耐心和宽容。

马里乌斯·B. 詹森

导论

普林斯顿大学 马里乌斯·B. 詹森

本卷论述的是 19 世纪的日本。¹ 那些认为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一个转折点的历史学家们，通常会把这个世纪在四分之三处拦腰斩断，而我们则将这个世纪视为一个整体。明治维新当然标志着日本社会历史的一个分水岭，但如果失去对其前后所发生事情的透视，也就不可能分析维新运动的种种要素。

我们看到，19 世纪的日本从一个国土分封、政治分立、社会分裂和国际分离的国家开始了转型。由于它对冲绳、千岛群岛和北海道的主权尚未确立，此时的日本边界尚未明晰。在政治上，日本仍然实行着自 17 世纪初就开始的土地分封的架构。德川将军握有对产出全国稻米产量大约四分之一的土地的支配权，而这是测量生产力的唯一标尺。但是，虽然他为其家族保留了大约一半土地，即所谓“天领”，其余部分还是分封给了诸藩。国家的平衡被大约 260 个封建领主瓜分，这些领主再依次将其握有的部分土地分配给自己的家臣。诸藩在其内部管理上实际是自治的：各藩都有自己的军队，自己的行政体系，以及自己的都城，在那些较大的藩里，这些城市已经在大名城堡的周围成长起来。作为领主之首，幕府将军并不对领主和诸藩征税，它的税收来源仅限于自己的领地。

不过，大名们被期待扮演忠于幕府将军的角色，在没有战争的时日，服侍幕府已经成为以交替到场的规程所表现的仪式化行为，由此大名们在幕府都城江户的寓所耗费了他们的一半时间。在江户，许多大的屋苑，通常为三间一处，闲置起来以供大名们居住，大名们建造这些房屋作为他们及其家臣执勤停留期间的寓所和要塞。当大名回到自己领地时，大名家庭及其最重要家臣的家庭，被要求留在江户作为人质。于是，大名们通过在幕府领地逗留期间的开支对将军的财富作出贡献，而他们在自己藩内大体上是自治的，甚至当他们居留江户期间也享有几分治外法权。但是，他们的家庭留为人质的事实，意味着在第一代大名之后，统

治精英都在江户出生和成长，仅在继承统治权后方能了解其领地，比起自己领地上问题和现实来，他们更熟悉江户的奢华和都城的礼仪。反过来，在大多数场合下，大名也要求自己的家臣长期居住在本藩的城下町。结果，主要军事力量成为一个循环的、高度城市化的身份集团。政治形态被预设在农村居民解除武装和驯服依从的基础之上，农民们受到 16 世纪晚期一些法制措施的约束。当时，丰臣秀吉及其同侪立法区别武士和农民，解除农村居民的武装，并执行地籍登记制度，为未来农村的管理和生产力发展考虑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基础。

日本社会也是分裂的。尽管德川时代的生活福祉相对有所发展，产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但确立于 17 世纪早期的士、农、工、商四个社会群体，仍然继续维持着明显的身份类型，表现在服饰、外貌、规矩习惯和行为方式，以及居住条件上。特别是武士，作为一种替换早期领地分封极端措施的合理化管理，他们的封地多半已被其领主所支付的俸禄所取代，在经济增长期间依赖固定收入维持生活，而当其领主需要附加额外收入时，就会压缩他们的俸禄标准。领主及其封臣经常以同样方式向商人负债，这些商人通过已经有所发展的商品市场机制，把他们的稻米收入变为可使用的货币。和平的岁月已经消磨了武士们的战争癖好，为领主服务的时光把武士们从一种未受教育、不守规矩的暴力机器转变为受过教育、循规蹈矩的官僚，急切地为他们可能得到的职位而相互竞争。武士阶级已经成为一种学非所用的、非生产性的社会精英。尽管如此，虽然武士在下层等级中进进出出，乃至出卖他们的身份资格，1800 年定位的武士俸禄仍然大致保留在两个世纪之前的水准。

1800 年，大多数日本人都是农民，生活在 7 万多个乡村里，这些乡村把一些孤立的小村庄约束为行政单位。³ 德川幕府希望全体农村居民都勤劳苦干，遵从他们自己精英的指示，这些精英是拥有土地的农民，他们具有村庄成员资格，有权得到供水，并能在裁决有关共同利益事务的村庄集会上发表见解。村庄被作为一个单位承担税负，这一负担在那些同样拥有土地的家庭间分派，而这项工作由一个接受任命或选举出来的首领领导。村民家庭被安排为 5 个组，以便相互监督和责任共负。尽管税负沉重，起初平均占到产量的 50%，但村庄仍是相当自治的，这要感谢武士官吏的缺席，他们生活在城下町里，而且只和村庄的头头打交道。新土地的开垦，农业生产的改进，以及少报收成等等，使得农村居民较为繁荣，也使他们较少回应那些对其课税的期望。到 1800 年，农民地位的假定一致性已

经让路于更为多种多样的景象，身处管理层的农民正在从各地成长起来的商品性农业中获益，他们把经济作物用船运到大阪和江户这些巨大的中心都市。文化知识在乡村领袖中的普及，促进了生机勃勃的交易活动，也促使有关农业的文字和城市印刷术提供的其他产品一道，在农村居民中广泛传布。一种单一文化正越来越重塑着整个日本的所有社会群体，即使仍在继续按照过去的身份分类对人口进行划分。经济的变化已经造成了社会现实的变化，但在正式的社会关系中尚未体现出来。

在 19 世纪初，日本脱离外部世界的孤立状态也继续着从 17 世纪 30 年代开始以来的状态。仅与朝鲜维持着国与国的关系，在德川时代，朝鲜共派出 12 次使节前往日本，可是这种关系却由于通过对马岛（Tsushima）大名来执行而受到削弱和掩蔽，对马岛大名在不平等和有伤朝鲜尊严的情况下维持着位于釜山的贸易据点。在长崎，荷兰东印度公司一直维持着一个贸易据点，1799 年被废止，后由爪哇殖民当局延续下来，荷兰人从巴达维亚派出商船，它们的代理机构驻在处于幕府官员的严密监视之下的人工堆造小岛——“出岛”上。长崎还保留着一个中国的贸易站点，私人贸易商把运来的商品卖给幕府授权的行会代表。萨摩藩南部通过其控制的琉球王国，也有获得中国商品的通路。然而，随着多年来日本银矿、铜矿的耗竭，特别是日本自己手工业的发展，替代了在贸易中备受欢迎的中国丝绸和刺绣织物，从而减少了来自中国和荷兰的商船数量；与实际需要相比，贸易已经变得更像是一场仪式。⁴

到了本卷结尾的 19 世纪末，日本已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它的政府几乎不能容忍地方的多样性和分歧。一个强有力的政府部门（内务省）任命县长和市长。国家警察系统用一张遍布全国的警察站点网络和无数用来装相互检举街坊邻居奇怪言行材料的木盒，取代了以往形形色色的地方控制。文部省为每间学校规定课文，教育系统是如此步调一致，以至于可以料到全国各地的学生将在同样的时间，使用同样的教科书，讲授同样的课文。阶级和身份的严格区分已经让位于一个雷同化的平民国家。封建时代的贱民群体虽已在法律上得到了平民的身份，却继续遭受着歧视之苦；以往地位最高的精英人士已被公开宣布为新的贵族（华族），以便对以新的方式构建起来的帝国议会中可能的激进主义提供一种保守的平衡力量。这个国家正在培养对于身着军服的君主的感激和崇拜，天皇的照片正开始出现在甚至最卑下家庭的墙上。

以往各种各样区域的和个人的差异都被政府抛掷一旁，取而代之的是坚定地